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游戏八股文集成

黄强 王颖 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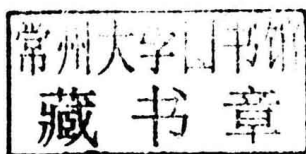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游戏八股文集成

黄强 王颖 辑校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戏八股文集成/黄强,王颖辑校.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12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17187-9

I. 游… II. ①黄… ②王… III. 八股文—选集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830 号

责任编辑:刘新英 胡 荣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40.75 字数: 888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187-9 定价: 27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 1300 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 19 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考试与教育》，《胡适文集》第 12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8 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3、136 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① 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1256）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璘、周鏊、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① 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② 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它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②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①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② 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曼兹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元登科记保存稍多，明清有关文献尤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世奇编《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余篇，清文1集，选文290余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游戏八股文研究》、《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唐代科举与试赋》、《〈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我们这套《中国科举文化通志》，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等在学术上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指导；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立支持《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15年4月13日

于武汉大学

引言：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

《游戏八股文集成》第一次将现存的且尽可能搜集到的游戏八股文汇为一编，以飨读者，其中不乏赏心悦目之作。

游戏八股文是中国古代文体家族中极为特殊的一种。它从正宗的八股文中衍生出来，或与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科举时代，游戏八股文就不起眼，推崇正宗八股文的明清文人绝大多数对之不以为然，随着科举制成为历史，曾经喧闹一时的八股文烟消云散，它更是湮没无闻，以至今人极少知道中国古代文章中曾有过游戏八股文一体。但正如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是由每一个生物种类所构成的一样，文体的多样性也是由每一个文体种类所构成的。文体的多样性反映了文体演变的规律，每一种文体都是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无论这种文体大小如何，品位高低，均有其考察的意义，更何况游戏八股文的“游戏”性质，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都是对正宗八股文的一种反拨呢？

游戏八股文的由来

游戏八股文是相对于正宗的八股文而言的，因此要说明何谓游戏八股文，首先要了解正宗的八股文的主要特征。

正宗的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因其考题主要出于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在内的“四书”中，所谓“代圣贤立言”，所以又称为四书文；因其文体形式主要脱胎于宋元科举文体——经义，所以又沿用了经义的名称；因为皇帝的诏命称“制”，士子奉命而参加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又是表达经书的义理，结合这两层意思，所以八股文又称为制义，而在明清文人眼中，制义也是一种文艺或技艺，所以也可以称为制艺；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八股文要揣摩和迎合时下的文风，所以又称为时文。这些异称都和游戏八股文有关系。游戏八股文可视之为“仿经义体”、“仿时文体”、“仿制义体”、“仿制艺体”等。

正宗八股文的文题多种多样，但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大题，一般摘取经书中或一句，或数句，或一节，或全章为题。以经书中完整的一章为题。如《论语·学

而》共十六章，第一章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举此为题称全章题。游戏八股文当然不会使用这么长的全章题，但单句题还是很常见的。第二类是小题，大都用于童试等小考。为了增加题目的难度，避熟就生，截取“四书”的文句，让考生根据不同的要求，揣摩被截取的部分与原文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再行作文，于是乎创出种种割裂变化、纤佻琐碎的题型。根据被截取的部分的不同，小题又分为截上题、截下题、承上题、冒下题等各种题型。如《论语·里仁》云：“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仅以“不以其道得之”为题，叫截上下题。此类题既必须将上下文的意思融会贯通于文中，却又不能连上触下，即正面论及上下文。游戏八股文主要使用小题。第三类是不入流的截搭题，虽是为了避免猜题而刻意陌生化，但出题者往往受人诟病。也有出得好的，故不可一概而论，明清科举时代的低级别考试如县试中常常可以见到，即使是乡试中也不是没有。截搭题，顾名思义，先截后搭。或于经书中任取相连的两句，截下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头；或任取相连的两章，截取前一章的末句，搭上后一章的首句；甚至还有将不在同一篇中的两句截而相搭的。题目字数少者为短搭，字数多者为长搭。截搭的两部分内容可以看出有相通之处的谓之有情截搭，乍一看两部分毫无联系者谓之无情截搭。如“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和“子曰：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是《论语·述而》篇接连的二章，取“夕死可矣，子曰士志于道”为题，属隔章有情截搭题。游戏八股文虽很少使用截搭题，但有些类型就是使用截搭之法勾连成文的。

八股文的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题、起比、出题、中比、后比、束比、收结十个部分，其中起比、中比、后比、束比分别由两股相对的文字组成，谓之八股，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的每两股之间字数不强求一致，但大体上对偶，并讲究声韵的抑扬顿挫，所谓排比声调，裁对整齐；这四比之间又往往构成起承转合的关系；因此，八股文是相对于律诗的“律文”。但上述结构是被抽象出来的一套最基本的八股文体制，实际写作时仍有相当的灵活性，例如，作为连缀和过渡成分的领题、出题可以省略；如果后比已经写得很充分，束比也可以不要，这样就只有六股。当然也可以尽情发挥，写成十股、十二股乃至十六股。更有甚者，面对特定的题目，如果觉得分股别扭，那就干脆不分股，例如唐顺之所作《孟子》“尽信书”一章题文便是。文云：

大贤言书不可以尽信，而质以《周书》之诬也。

盖书不可以尽信，而《周书》之可疑者乃其证也。君子观于书也，容可以无见哉？

孟子因世之泥书而害理者，故其好古之下，有感而为之言曰：

书所以录当世之迹，而垂后世之规，固不可以不信者。但传疑本史氏之体，容非综核之真；爱憎出一时之情，或有揄扬之过。盖学者诵其言，而断之以理，无病

于书也。苟不度其是非而尽信之，则不道之心，滋于见闻之误；而私意之惑，起于影响之凭。以古人垂世之迹，而反为误世之文，则又不若无书之为愈矣。

他固未暇辨也，《武成》之书，所以纪武王之事者，宜若皆实录矣。吾观其始终颠末之详，而稽其会文切理之要，其可取者，仅二三策而已焉，他固未足信也。是何也？盖仁者，好生之德，足以得民；神武之威，至于不杀。无敌于天下者，乃其理之常也。今武王，至仁也；纣，至不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曰血之流杵，则圣人之取天下，必假于杀戮之功；而仁人之于天下，不见乎无敌之验矣。吾固以知书之不足尽信也。学者能因言而会之以心，考迹而断之以理，则天下之书皆吾益矣。不然，宁不反为书之所误也哉！

题出《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作者对题义的深入发挥此处置之不论，值得探讨的是这篇文章的形式，说它是八股文似乎有点冤枉，因为绝对无法像对一般八股文进行分股那样对待它。它无股可分，硬要分析，也只能说它依据题义前断后案——前幅断出结论，后幅“他固未暇辨也”句后以《周书·武成》为例加以印证，最后数句总结。此文收在方苞编的《钦定四书文》中，可以说是范文了，评语中并未特别指出其不分股的特点。这只能说明，形式服从内容，高手即使写八股文和评八股文也不例外。章学诚说得十分明确：“八股称四书文义，乃流俗俚语。文体分股，八股为篇，经传子史，往往有之，何必四书文义独擅其称？而四书文义则又何尝必定拘股于八？此亦临文不可不审思也。”^① 这里的问题同样提示了今人。

从上述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正宗八股文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因素，这些文学因素成为游戏八股文诞生的条件。

第一，代言体的虚构因素。在中国古代文章体裁中，只有八股文是代言体。不同的代言对象有不同的口吻，为之代言就必须梦往神游、设身处地，各肖其音容笑貌，因此，对作者而言，借八股文立言的过程，也就是化其身代言对象的过程，传代言对象之神、刻画其形象的过程。做“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毫无选择的余地，虚构性受到很大的限制；目标老是集中在少数圣人贤人身上，未免单调。好事的文人便转而寻求其他代言对象，兴之所至，走笔为文，正面的、反面的，想写什么题目就写什么题目，不必强迫自己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俨然以常人之心忖度圣人之心，于是，“四书”中的三教九流皆成为代言对象。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皆成为游戏八股文的代言对象。以《西厢记》曲文为题的《西厢》制艺就是代张生、莺莺、红娘立言的游戏八股文。

第二，题型多样化的文学因素。八股文的题目从大题到小题到截搭题，从章句完整到琐碎再到割裂，从题义明白正大到隐晦费解再到难以琢磨。从有利于考生发挥儒家经

^① 《论文示贻选》，《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页。

典的本旨为标准来衡量，大题无疑是最称职的，但如果以能否展示“文心”、运化巧思为标准来衡量，结果恰恰相反，小题能给作者以更大的自由。大题所谓明白正大者，上下文界限分明，文义完整明朗。作大题文，在代言的过程中，作者固然很难“越轨”，却也因为思维的被动性而很难具有文心活跃带来的愉悦。小题则因为命题者有意使经典章句的内涵外延陌生和不确定，从而造成了作者理解取向的多元性。“断”章取“义”，章被“断”得越残缺，小题越“小”，与经典思想体系的关系越疏离，作者的理解取向就越多，于是，相对于大题而言，代言者在被动中有“主动”，在理解取向的选择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获得了文心活跃而带来的愉悦。正因为如此，在八股文脱离“代圣贤立言”的束缚之后，出现了叙事题、游戏题、比兴题、俚俗题、咏物题等小题类型，题型名称本身透露出某种文学意味。孙仁孺的《东郭记》虽是传奇，但每出标目采用《孟子》原句，第三出《少艾》和第二十出《早起》就是运用了八股文小题作法的游戏文字。岂只是小题，只要不是荒诞不经的截搭题，其之所以出现，并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企图曲尽文章之能事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制义丛话》卷二十二中称“茹古香尚书菜编次《吟花课艺》，所列题目皆工俚可喜”，并节录如下：“色难、才难”，“亦足以发、未之能行”，“八佾、三军”，“管仲之器、冉求之艺”，“参乎吾道、回也其心”，“子谓南容、子见南子”，“乘桴、自牖”，“束带、拖绅”，“三仕、三黜”，“屏气、曲肱”，“我欲仁、子欲善”，“一日克己、三年有成”，“子路率尔而对曰、夫子莞尔而笑曰”，“无违夫子、讪其良人”等。^① 这些联对而成的截搭题，拆散开来，词句在原来的语言环境中都有各自的意义，剥离出来重新组合，必然形成新的意义呼应，这种新的意义呼应很难完全返回到儒家经典的体系中去。本来，将它们割截并组合就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现在，这种新的意义呼应为作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例如，“色难、才难”一题，“色难”出于《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此处指孝亲之际，和颜悦色是很难做到的。而到了这一截搭题中，显然已成了才色之“色”，以此题为文，与原来的语言环境已风马牛不相及，而这种新的意义呼应正是八股文文学因素的一种生发之地。诗钟的分咏体将两个互不相干而又反差极大的事物对举为题，要求作者用一联将两者配搭起来，而且要搭得天然巧妙，言近旨远。例如“庸医·八字”，最佳之作是：“新鬼烦冤旧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这正是利用了八股文截搭题的手法。

第三，“律文”的文学因素。八股文作为“律文”，特重谋篇布局：一题树标，八股归统，起承转合，勾连成文，要求作者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文章，注意内部的逻辑联系；而排比连缀，分股对偶，又饶有参差错落的声韵之美。明清文人自幼熟谙此道，一旦以“代圣贤立言”之笔转而从从事自己乐于表现的题目，自是如鱼得水。通常认为八股文是“戴着锁链跳舞”，“螺蛳壳里做道场”，但清代李渔说：“分股则帖括时文是已，先破后承，始开终结，内分八股，股股相对，绳墨不为不严矣。然其股法句法，长短由

^① 引自《制艺丛话》卷二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页。

人，未尝限之以数，虽严而不谓之严也。”^①更何況游戏八股文乃作者即兴之作，无须像场上应考那样考虑文章的程式是否合乎规矩。既能利用八股文的文体特征，又有一定的行文自由，何乐而不为？游戏八股文中不少基本合乎八股文体式的作品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四，文章技法的文学因素。八股文讲究“为文之法”，有其技巧趣味。章学诚《文史通义》述“制义之公”云：“脱增减兮毫厘，即步移兮影徙……或语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云去而尚留，如马跃而未逝。纵收俄顷之间，刻画几希之际。水平剂量，何足喻其充周；历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②包世臣称八股文“凝思至细，行文至密。所有近辉远映、上压下垫、反敲侧击、仰承俯引之法，反较古文为备”。^③要作好八股文，就必须处理好若干对关系，说它们是一种辩证关系也不为过，如断与连、吞与吐、揖与让、虚与实、正与反、直与曲、急与缓、起与伏、开与合等。八股文的技巧趣味正寓于对这类关系的微妙的处理之中。游戏八股文使得八股文的技巧趣味获得了更充分的表现。

八股文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综合性最强的一种。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兼容了几乎所有文体的重要要素，又形成了区别于古文等文章体裁的鲜明特征。诸如代言体的虚构性、题型的多样性、“律文”的声韵特性、为文之法的趣味性，这些特征集于一体，确也不可谓非文格之创体。当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时，其实用性相对掩盖了文学性，而游戏八股文则将此种文体运用于文学领域，减少了其严格束缚所造成的弊端，大大张扬了八股文的文学性。自幼从事八股文训练的明清文人在日常练笔时，很容易产生八股文的游戏之作。

所谓游戏八股文是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而写成的或幽默、或诙谐、或庄重、或嘲讽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能够体现八股文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的各类文体。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游戏八股文不等于都是正宗八股文的结构形式，更何况如上所述，即使是正宗八股文也不一定分股对偶。从现存的被清代文人称之为“制艺”的游戏八股文看，集“四书”原句为题的作品在文章形式上相当随意，根本不是正宗八股文的结构形式，因此，“游戏八股文”的范围宜宽而不宜窄。我们称其为“游戏”的八股文，既指内容方面的游戏性质，同时指形式方面的游戏性质。惟其在形式方面具有浓厚的游戏性质，所以只要是与游戏八股文同一系列的作品，直接视其为游戏八股文亦未尝不可。可以是诗，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戏曲、诗钟等。作为游戏八股文的诗歌、小说、戏曲是特殊的文体。在八股文出现以前，没有这一类的诗歌、小说、戏曲；

①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李渔全集》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25页。

②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言公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8页。

③ 包世臣：《论文·或问》，《艺舟双楫》卷二，《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86册，第110页。

失去了它们所蕴涵的一种或几种八股文的文章要素，也就失去了它们不同于一般诗歌、小说、戏曲的特殊趣味。所以，物以类聚，着意运用八股文体裁写成的《西厢》制艺是游戏八股文，随意运用各种体裁阐述“四书”章句微言大义传奇《东郭记》、小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七律《论语诗》以及诗钟也是游戏八股文。

焦循认为八股文“亦可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其破题、开讲，即引子也；提比、中比、后比，即曲之套数也；夹入、领题、出题、段落，即宾白也。习之既久，忘其由来，莫不自诩为圣贤立言，不知敷衍描摹，亦仍优孟之衣冠”。如果将传奇和八股文的体制结构机械地等同起来，确乎大谬，但八股文以八比为主体部分，两两相对成文，夹入、领题、出题、过接等附属于八股，一般使用单句。元杂剧套曲与宾白之间的关系与此有相似之处。古人一般重套曲唱词而轻宾白，套曲对句较多，宾白一般用散句，穿插于各支曲子之间。有鉴于此，焦循认为排比在八股文中的地位与作用相当于套曲在杂剧中的地位与作用，夹入、领题等则与宾白相类，亦自有其道理。所以焦循问道：在八股文中“叙述庾斯抽矢、东郭乞余，曾何异传奇之局段耶”？反之，以传奇演“东郭乞余”，又何异于八股文？只不过是游戏八股文而已。孙仁孺的《东郭记》传奇就是这样一部游戏之作。全剧四十四出，以《孟子》中有一妻一妾的齐人为主角，另设淳于髡、陈仲子、王骀以及一妻一妾为配角。每一出戏的标目均使用《孟子》中的现成语，合四十四出标目而观之，恰似一八股文系列。其高妙之处在于为《孟子》中人物立言，逼真人物声口。孙氏自己就将此传奇等同于游戏八股文，在卷首特地将友人萧伯玉题名为“齐人”的一篇游戏八股文附列，作为《东郭记》的“别录”，并且认为此文“游戏之仙，滑稽之圣，当不令汤若士独有临川”。清代文人也将《东郭记》视为游戏八股文。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云：“全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贵利达’一语，盖骂世词也。”也就是说，《东郭记》四十四出阐述的就是一句话：“求富贵利达。”无怪乎夏荃《退庵笔记》卷十二谓此剧“直以戏文为时文，认真做虚缩题矣”。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虽是一部小说，但它以经言命题，或由作者叙述，或代“四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立言，每一卷都是独立的，体制结构与八股文颇为相类。题目后的一首诗或词是破题，然后解释这首诗词，这部分是承题。解释过后照例安排一个小故事，主旨与正文故事相映衬或相对比，是起讲。针对这个小故事的主旨会有一首诗加以总结，相当于八股文的缴结。正文故事有散有韵，散文部分叙述主体故事，类似于八股正文。最后有一篇诗歌作为大结束。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把《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归为“译述性质”，认为“去通俗小说甚远”，很有道理。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袁黄，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对八股文的作法有很深的研究。他把八股文作法糅合在演义小说之中，为“四书”人物立传，游戏色彩十分浓厚。四十卷文字不啻是四十篇游戏八股文。

至于游戏性质的“八股诗”，清初也已出现。诗歌格律化的最终结果是律诗，文章格律化的最终结果是八股文，律诗和八股文之间又结构相似，声气潜通。吴乔《围炉

诗话》卷二云：律诗“遵起承转合之法者，亦有二体：一者合于举业之式，前联为起，如起比虚做，以引起下文；次联为承，如中比实做；第三联为转，如后比又虚做；末联为合，如束题”。当用这种“合于举业之式”的律诗来代圣贤立言时，也就成了游戏八股文，例如尤侗的《论语诗》。

诗钟最早的形式是分咏格，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文学类“诗钟之名称及原起”条云：“以诗钟名为最通行。始于道、咸间，殆仿制艺之截搭题而作，盖截搭合二题以制一文，诗钟亦合二题以制一联也。”其与《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的各篇虽长短悬殊，但均出现于八股文盛行之后，具有八股文的文章要素，所以都属于游戏八股文的范围。

游戏八股文的数量和种类

游戏八股文的出现也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阐述《西厢记》曲文的微言大义的论是游戏八股文的萌芽。唐宋科举考试的文体中，论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乃至在宋代形成了专门研究试论作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论学”。

宋元的论和经义均采用“十段文”的结构体制，明清八股文便是由这种结构体制发展而来。明弘治戊午年（1498）刊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首有《“秋波一转”论》和《“松金钏减玉肌”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使用论的体裁阐述《西厢记》曲文意蕴的作品，可说是游戏之论。这种游戏之论绝对不可能只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两篇。如同论和经义的“十段文”结构体制孕育出了八股文一样，游戏笔法的《西厢》之论也孕育出了后来以游戏笔法写成的《西厢》制艺。明代八股文名家早就认为熟读《西厢记》有助于写好八股文。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引顾宪成云：“北《西厢记》兴致流丽，学者细味而吟咏之，则描神写景处，自有一种仙风道骨，恐不减四家之文矣。”^①细味而吟咏《西厢记》，就能够写好八股文，那么，学游戏笔法的《西厢》之论，以八股文揣摩《西厢记》优美的曲词也就顺理成章。

《西厢》制艺一旦出现，文人的游戏神通由此及彼，一发不可收拾。许多文献记载表明，明清文人染指游戏八股文乃一时风气，不妨罗列数则，以见一斑：

1.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云：“万历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然未至如（周）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申圣言者，而作‘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其无所忌惮如此。”^②由此看来，搜取“四书”中风流话头作游戏八股文，明代万历以后已开风气，连周延儒这样后来中了状元的人也在所不免。

2. 孙仁孺《东郭记》传奇刻本卷首附列萧伯玉题为《齐人》的游戏八股文一篇，

^① 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卷六“涇阳顾先生论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册，第232页。

^② 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